

# 基于元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吴墨源,黄婷红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文章采用元分析方法对2007—2015年间使用SCL-90量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共20篇研究报告纳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合并效应量波动范围在0.144~0.328,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但是没有预期严重。焦虑和恐怖两个因子最为突出,在研究跨度时间内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婚姻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影响。不同地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明显,内陆地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比沿海地区差。

**关键词:**心理健康;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6)05-393-005

**doi:** 10.7655/NYDXBSS20160513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sup>[1]</sup>。根据2009年的统计,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sup>[2]</sup>。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和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此制定相应政策,已然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心理健康水平是了解一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许多研究者关注,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研究。但是综合已有的研究报告,研究结果却存在较大的分歧。大部分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sup>[3-7]</sup>,也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SCL-90总均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up>[8]</sup>。对群体内部的研究表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农民工<sup>[9]</sup>,也有研究认为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较差<sup>[10-11]</sup>。有研究者考察了婚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蒋丽平<sup>[12]</sup>发现未婚的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不如已婚,廖传景等<sup>[13]</sup>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胡庆

林<sup>[14]</sup>的调查则没有发现已婚和未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究竟如何尚无公论。由于各研究的被试选择、样本量以及施测条件不同,使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系统性评价。本研究目的是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的差异,不同性别、婚姻情况和在不同地域工作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得到可靠的结论。

## 一、资料与方法

### (一)文献收集

在中国知网、维普资讯、万方数据以及Fulink福州地区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sup>①</sup>,分别以“SCL-90”、“Symptom Check list 90”、“症状自评量表”、“心理健康”、“心理状况”、“新生代农民工”、“青年农民工”、“80后农民工”和“90后农民工”组成并列的题名、关键词和中文摘要的主题词搜索并筛选文献。

研究在文献搜集时采用如下标准:①测量工

**收稿日期:**2016-01-11

**作者简介:**吴墨源(1991-),男,福建漳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认知与学习。

①Fulink平台是福州市八所高校创建的专业的学术搜索门户,目前包含264个中外文数据库,可以搜索到图书馆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纸本和电子资源,例如中外文图书、期刊、论文、标准、专利和报纸等。

具为 SCL-90 量表; ②考察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 ③研究结果提供 SCL-90 量表 9 个因子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包括样本, 各因子平均分和标准差。排除标准: ①研究对象不是新生代农民工, 或者研究涉及农民工数据, 但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数据无法提取; ②基本数据, 即样本量、因子均值和标准差三个数据没有提供, 存在不清晰, 或者存在明显错误并且无法修正; ③相同作者, 同一批数据重复发表的情况。

按照以上标准, 我们共检索到 89 篇文献。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次筛选, 对初选的文献全文阅读进行再次筛选, 最终符合研究要求文献共 20 篇, 研究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所纳入的研究发表年份为 2007—2015 年, 其中, 2007—2009 年每年 1 篇, 2010 年 2 篇, 2011 年 1 篇, 2012 年 4 篇, 2013 年 4 篇, 2014 年 4 篇, 2015 年目前为止有 2 篇。由于研究数据收集到发表有一定时间间隔, 我们将发表年份扣除 1 年作为数据搜集时间, 因此, 数据收集时间跨度是 2006—2014 年。总样本量为 8 934 人, 样本量最大为 1 212 人, 最小为 89 人。

(二) 变量编码

按照以往对 SCL-90 影响因素的研究, 以及所纳入研究文献的数据特点, 我们对性别、婚姻和地域进行编码, 其中地域分为沿海和内陆地区。

(三) 统计学方法

鉴于 SCL-90 分数属于连续型数据, 我们选加权

表 1 文献收集情况

序号	作者	数据收集时间	样本量	总分	标准差
1	刘晋洪 <sup>[3]</sup>	2007	227	137.71	39.48
2	贾凤芹 <sup>[4]</sup>	2008	89	134.19	-
3	郭洪波 <sup>[5]</sup>	2009	1 212	140.56	41.54
4	廖传景 <sup>[6]</sup>	2010	384	141.73	46.07
5	蒋丽平 <sup>[12]</sup>	2010	260	155.03	48.47
6	闫凤武 <sup>[10]</sup>	2011	676	157.06	-
7	卢光莉 <sup>[15]</sup>	2012	463	176.33	-
8	杨卓耸 <sup>[7]</sup>	2012	222	132.27	55.80
9	黄文兰 <sup>[8]</sup>	2012	507	130.04	-
10	胡庆林 <sup>[14]</sup>	2012	763	172.11	37.64
11	谢金 <sup>[16]</sup>	2013	120	-	-
12	周小刚 <sup>[11]</sup>	2013	705	151.68	-
13	孟亚 <sup>[17]</sup>	2013	303	155.71	44.23
14	张学军 <sup>[18]</sup>	2013	315	150.50	45.20
15	姜亚丽 <sup>[19]</sup>	2014	615	144.39	39.04
16	廖传景 <sup>[13]</sup>	2014	407	143.16	40.92
17	李祝敏 <sup>[20]</sup>	2014	296	146.00	54.00
18	杨虎民 <sup>[9]</sup>	2014	412	151.87	41.68
19	陈艳玲 <sup>[21]</sup>	2015	426	-	-
20	王李艳 <sup>[22]</sup>	2015	532	180.40	-

均值(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作为效应量。在计算置信区间时, 先进行异质性检验。如果异质性显著,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  $\chi^2=282.42, P=95.8%, P < 0.001$ , 所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的统计检验计算出合并效应量的 95%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以 95% CI 是否包含“0”作统计推断, 倘若包含 0, 则没有统计学意义。依据 Cohen<sup>[23]</sup>的标准对效应量大小进行判断: 效应量 (绝对值) 分成“小”效应 ( $0 < WMD < 0.2$ ), “中”效应 ( $0.2 < WMD < 0.7$ ), “大”效应 ( $WMD > 0.8$ )。合并效应量小, 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差异小, 反之表明二者差异大。研究的计算涉及新生代农民工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比较标准是金华等<sup>[24]</sup>发表的 SCL-90 测量数据为成年常模。研究还涉及不同性别、婚姻状况以及不同地域的亚组分析。另外, 通过敏感性分析来判断结果的稳定性, 通过漏斗图来估量发表偏倚。所有研究的计算由 SPSS17.0 软件和 Review Manager5.0 软件进行。

二、结果

(一) 新生代农民工 SCL-90 分数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将纳入研究的数据作为实验组, 全国成人常模作为控制组进行比较, 合并效应量和 95%CI 值如表 2 所示。与全国常模相比, 效应量均为正值, 波动范围在 0.144~0.328, 且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 说明具备统计学意义, 研究得到的 9 个效果量均高于全国常模, 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 Cohen 的经验判断标准, 除了人际敏感的合并效应量落在小效应上, 其他因子均在中效应。各因子中, 合并效应量最突出的为焦虑因子和恐怖因子, 分别为 0.328 (0.190~0.446) 和 0.320 (0.238~0.402)。

为了解在研究所跨的时间段内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变化, 我们将纳入研究的 SCL-90 各因子与年代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各因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 SCL-90 的合并效应量

因子	与全国常模比较 (95%CI)	P 值
躯体化	0.204(0.125~0.283)	<0.001
强迫	0.248(0.160~0.336)	<0.001
人际敏感	0.144(0.051~0.237)	<0.001
抑郁	0.231(0.132~0.330)	<0.001
焦虑	0.328(0.190~0.446)	<0.001
敌对	0.274(0.155~0.393)	<0.001
恐怖	0.320(0.238~0.402)	<0.001
偏执	0.231(0.135~0.328)	<0.001

子的相关显著性均大于0.05,表明SCL-90各因子与年代并没有显著性相关,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

在2008—2015年间心理健康水平稳定,并没有出现显著性变化。

表3 新生代农民工SCL-90结果与年代的相关性分析

因子	总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r值	0.299	0.338	0.392	0.266	0.288	0.351	0.228	0.201	0.361	0.250
P值	0.201	0.145	0.088	0.257	0.219	0.129	0.333	0.396	0.174	0.288

(二)不同亚组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SCL-90分数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婚姻情况和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SCL-90各因子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以男性数据为实验组,女性数据作为控制组,不同性别的农民工SCL-90各因子分析显示:9个因子的效应量波动范围在-0.086~0.042,7个为负值,2个为正值,各因子的95%CI均包含0,不具备统计学意义,说明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别。

以已婚农民工为实验组,未婚为控制组进行分析。各因子效应量的波动范围为-0.115~0.057,7个为负值,2个为正值,除了抑郁因子外,其余因子的95%CI均包含0,不具备统计学意义,而抑郁因子在

95%CI内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婚姻因素同样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影响不大。

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地域差别的元分析比较。由结果可以看出,总分各因子的合并效应量波动范围在-0.124~0.308,且95%CI均不包含0,说明各因子的计算都具备统计学意义,各因子合并效应量均为负值,说明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内陆地区。从各因子上看,躯体化、人际敏感、焦虑、偏执这4个因子均达到中效应,其中焦虑因子最为突出,为-0.308(-0.560~-0.055)。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内陆地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工,尤其在焦虑因子最为突出,需要引起关注。

表4 不同亚组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SCL-90的合并效应量

因子	男女性别比较		已婚与未婚农民工比较		沿海与内陆农民工比较	
	-d (95%CI)	P值	-d (95%CI)	P值	-d (95%CI)	P值
躯体化	-0.042(-0.107~0.192)	< 0.001	0.057(-0.049~0.163)	0.020	-0.228(-0.366~-0.090)	< 0.001
强迫	-0.079(-0.197~0.040)	0.092	-0.099(-0.257~0.058)	0.194	-0.183(-0.335~-0.031)	< 0.001
人际敏感	-0.086(-0.265~0.092)	< 0.001	-0.080(-0.247~0.087)	0.338	-0.204(-0.365~-0.043)	< 0.001
抑郁	-0.056(-0.188~0.077)	< 0.001	-0.097(-0.192~-0.003)	0.052	-0.185(-0.355~-0.061)	< 0.001
焦虑	-0.084(-0.222~0.054)	< 0.001	-0.104(-0.221~0.013)	0.005	-0.308(-0.560~-0.055)	< 0.001
敌对	-0.023(-0.090~0.136)	< 0.001	-0.115(-0.304~0.074)	<0.001	-0.124(-0.304~-0.055)	< 0.001
恐怖	-0.078(-0.270~0.115)	< 0.001	0.011(-0.052~0.073)	0.262	-0.159(-0.287~-0.030)	< 0.001
偏执	-0.015(-0.115~0.085)	< 0.001	-0.071(-0.194~0.053)	0.006	-0.216(-0.383~-0.048)	< 0.001
精神病性	-0.017(-0.110~0.077)	0.224	-0.025(-0.165~0.115)	0.759	-0.182(-0.314~-0.049)	< 0.001

(三)发表偏倚性和敏感性分析

为有效保证元分析的可靠性,需要控制所纳入研究的偏倚性。本研究用漏斗图对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倚进行检验。图中散点分布对称,采用Egger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0.56, P=0.587$ , Begg秩相关结果显示: $z=0.55, P=0.583$ ,结果均说明发表不存在偏倚性。在敏感性分析上,按样本大小对文献进行分层分析,所得结果与未分层的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较好。

### 三、讨论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基本状况

农民工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在中国迅速城市

化的今天,长期城乡二元制导致的城乡差异,以及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投以关注。张波等<sup>[25]</sup>对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元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正常人水平,其中总分为大效应,各因子分为中效应。而本研究分析也得到类似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除了人际敏感的合并效应量落在小效应上,其余因子均为中效应,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但是总体差异不大,并且水平比较稳定,并没有逐年递增趋势。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确实不佳,但是没有以往学者预估的严重。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具有自身特点,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

景的工作岗位。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生活,以及了解更多排解心理问题的渠道。

由于农民工群体一直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调查结果是否受到研究者先入为主印象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各因子中,焦虑和恐怖因子最为突出。焦虑因子反映个体较易焦虑,容易表现烦躁,而恐怖因子则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存在社交和群体恐惧。本研究结果直观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不佳,与近年来一些研究一致。万懿等<sup>[26]</sup>研究也发现35.04%的农民工存在轻度以上的焦虑情绪,负面情绪问题较为严重,城市生活困难能显著预测焦虑水平。廖传景等<sup>[27]</sup>调查也发现青年农民工在恐怖因子上显著高于年长者,并且在社会交往上存在退缩和回避行为,焦虑和苦恼情绪。在当下集体性焦虑的社会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问题的同时,也面临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处于社会的底层,背井离乡而往往得不到家庭关爱和社会的支持。生活现实引发身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又引发对社会的恐惧和社交的回避,循环恶化,加剧原先不良的身心健康,总而言之,这种边缘化的处境正不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

除了边缘化处境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点也可能是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不佳的原因。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制造业更加普遍,劳动密集型产业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劳动和机械的管理,容易使劳动者思维陷于固化,情绪消沉,情感冷漠,没有成就感,只剩疲劳的身心。

###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在分析中,我们还考查了性别、婚姻和工作地域等不同亚组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尽管许多研究者以性别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生物学因素考虑,但并不总是能够得到阳性结果。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是成年人,生理和人格已经基本稳定,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部分就业于制造业,劳动强度和生活环境并没有像建筑行业那样对性别有特殊要求,因而性别差异不明显。在婚姻因素上,尽管婚姻是影响农民工心理症状、社交行为与感受的重要因素<sup>[28]</sup>,一些研究认为婚姻对农民工负面情绪有调节作用<sup>[29]</sup>。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已婚和未婚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同样没有显著性差异。由于调查样本大部分农民工是未婚群体,即使结婚大多也是新婚,这可能导致婚姻因素在分析中效果不够显著。另外,婚姻对心理健康

产生影响涉及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具体也有待进一步考查。在地域因素上,我们将研究群体分为沿海和内地两种地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存在地域效应差异,在内陆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焦虑因子最为突出。这可能受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无论工资水平,还是生活环境设施都要优于内陆地区。

### (三)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恐怖和焦虑因子突出。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婚姻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不同地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明显,内陆地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周小刚等<sup>[11]</sup>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演进机制是社会资本缺失和焦虑累积,其根源是社会文化固有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失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改善,需要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采取措施。当前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考虑如何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各个阶层,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做好户籍制度的协同改革,优化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最终消除城乡差别。企业应当改善管理,真正落实人本管理的理念。除此之外,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社区和企业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农民工心理援助和监督机制,也是改善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措施。

### 参考文献

- [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 工人日报, 2010-06-21(1)
- [2] 钟立灿.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结构和就业趋势分析[J]. 中国科技投资, 2013(A26): 416-417
- [3] 刘晋洪, 张泉水, 夏莉, 等. 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态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15(7): 644-646
- [4] 贾凤芹, 吴燕. 苏州市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民康医学, 2008, 20(23): 2823-2824, 2826
- [5] 郭洪波, 罗玉梅, 温菊芬, 等. 深圳市厂企劳务工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2): 220-221
- [6] 廖传景. 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性影响与保护因素[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1): 109-113
- [7] 杨卓耸, 耿明峰, 段志慧, 等. 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的成因、调查和预防研究——以浙江台资企业为例[J]. 中

- 国市场,2012(5):86-90
- [8] 黄文兰,曾天德,朱淑英.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127-132
- [9] 杨虎民.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155-156
- [10] 闫凤武. 齐齐哈尔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8):937-939
- [11] 周小刚,李丽清.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J]. 社会科学辑刊,2013(2):74-80
- [12] 蒋丽平. 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及生存质量的关系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
- [13] 廖传景,毛华配,张进辅. 青年农民工心理症状及影响因素:未婚与已婚的比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47-53
- [14] 胡庆林.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D]. 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 [15] 卢光莉,周新明.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现状调查研究[J]. 中国保健营养,2012,22(8):2452-2453
- [16] 谢金. 新生代农民工团体心理辅导实证研究[J]. 天中学刊,2013,28(2):128-130
- [17] 孟亚,王培席,李彦芳,等.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J]. 职业与健康,2013,29(23):3069-3072
- [18] 张学军. 运动处方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影响效应的研究[J]. 安徽体育科技,2013,34(5):48-51
- [19] 姜亚丽,王晓明,顾子贝,等. 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8):1199-1201,1202
- [20] 李祝敏,罗京滨. 异地务工青年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11):1667-1669
- [21] 陈艳玲,张俊杰,王平.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J].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5,40(1):102-104
- [22] 王李艳. 滁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171-172
- [23]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M]. CA:Academic Press,1988
- [24] 金华,吴文源,张明园. 中国正常人 SCL-90 评定结果的初步分析[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5):260-263
- [25] 张波,杨静,杨阳. 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元分析[J]. 大理学院学报(综合版),2012,11(2):27-30
- [26] 万懿,张腾霄,刘正奎.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困难和负面情绪的关系及婚姻的调节作用[C]//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南京,2013
- [27] 廖传景,刘琴,张进辅. 农民工社交回避及苦恼与心理症状的关系研究[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7):43-47
- [28] 舒姝,李辉,陈春媛. 心理研究农民婚恋观的结构及问卷编制[J]. 心理研究,2011,4(4):77-83
- [29] 万懿,张腾霄,杨辉,等.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与负面情绪:婚姻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1):163-166

## A meta-analysis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u Moyuan, Huang Tingh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is Meta-analysis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 total of 20 literatures researching the mental health by using the Symptom Check list 90 (SCL-90) during 2007 to 2015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effect size of all the factors concentrated between 0.144 and 0.328,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norm, but it was not serious as expected. The most serious factors were horror and anxiety.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remained steady in the duration of the stud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The marriage statu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The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in the interior regions of China suffered more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an workers in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status; meta-analysi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